

澳門衛生史試編*

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健康與城市建設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頭20年，在澳門設立健康設施和醫療服務設施及立法是當時抗病政策的主要內容，此外，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政策，例如植樹和城市衛生。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杜絕某些疾病流行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仁慈堂醫院於1569年由卡內羅成立。1885年成立了陸軍醫院。鏡湖醫院成立於1870年。1872年白馬行醫院動工。

衛生局最近幾年的報告上面，有各種登記的疾病的統計圖表，以及死亡的數字。這表明了人口總體健康狀況與城市住宅區衛生狀況之間的緊密關係。這樣便在黑死病和其他傳染性疾病的出現和蔓延，以及這些區不衛生狀況之間建立了聯繫。

根據當時的報告，最常見的疾病是肺結核、黑死病、霍亂和性病。這些報告是由在衛生局、公共工程局和市政廳進行多次抽查以後編寫的。它們對最主要傳染病灶地區進行了檢查，主要是住宅區或街道的樓房。這些報告包括了對城市衛生狀況的評價。首先，這些報告對提醒有關當局要在這些地方進行檢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呼籲有必要建立條件來達到這個目的。防治霍亂或其他傳染病最有效的辦

* 本文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門衛生問題及政策問題資料按主題和年代排列的彙編。

** 建築師，葡萄牙建築師公會卡什特洛布蘭科區代表處主任，葡萄牙建築遺產局卡什特洛布蘭科區局主任。

法之一是焚燒或全部摧毀傳染病集中的骯髒地區，然後按照當時最好的城市建設原則，對它們進行城市改造。同時，還採取了其他一些辦法：

- 1889年規定了海上衛生總則並採取了衛生預防措施，對那些乘坐專線火輪來澳門的旅客及貨物進行檢查；

- 由編內醫生對住家進行衛生檢查，因此將城市分成了若干區域；

- 勒令郎中報告病發情況；

- 娼寮章程(1886、1905年)；

- 在白馬行醫院、橫琴島(1878年)、氹仔(1881年)、過路環的九澳(1885年)設立了癩瘋院；

- 成立了種痘所(1888年)，為居民免費接種牛痘(1903、1917年)；作為非常有效的滅鼠措施和預防霍亂的辦法，設立了用氣泵打上來的鹹水消毒街道和清洗下水道的系統。這個建議是1909年提出的，1912年便開標為松山水塘購買水泵。1916年已經有報告說這一措施獲得了顯著的效果。

- 作為城市滅鼠和預防霍亂的措施，在城市下水系統中，全面地安裝了水力虹吸管。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一期間，澳門衛生局局長奧古斯托·達·席爾瓦和戈麥斯·達·席爾瓦醫生的工作非常出色，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這些負責人是本澳一流的城市衛生建築專家。他們寫下的報告對於政治決定的作出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些政治決定主導了整個城市改造的過程。

象徵性地把澳門形容成一個患病的動物

1909年——“可以把澳門設想為一個非常罕見的水陸兩棲動物。它躺臥在泥濘的海灘上，頭非常優雅地從海中慢慢伸出。

它的脊背露在太陽下，顯示了非常美麗的皮膚，微微曲起，似乎想把它那半露出水面的肚皮內的潰瘍隱藏起來。它的心跳得非常快。它有生命，但一切都陷在污泥中。它的營養都被這大面積的慢性潰瘍所消耗了。

這就是澳門。西望洋是它的頭。它的頭和脖子幾乎分不出來，內港便是它的肚皮，潰瘍在整個市場區、沙欄仔、沙梨頭、新橋、沙崗和田野中蔓延。它的脊背是那風景秀麗和衛生的對坡。港口的淤塞限制了它的活動，也影響了它的對外交通。城市與社會的潰瘍似乎已經無法醫治。它在不斷地發濃擴散，耗盡了它的生命力，使它苟延殘喘。

（雷登《澳門衛生》，1909年2月25日在澳門陸軍俱樂部的演講，第55頁）

1917年——“澳門半島不過是一彈丸之地，如懸掛在水中，通過關閘大馬路與巨大的香山島連接，橫臥在西江和北江的淤泥之中。它的形狀非常奇特，如同一隻狒狒的頭顱，它的嘴如同這溫順的動物的嘴那樣突出突入。為了能夠解釋它和狒狒這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可以來看一幅地圖。不需要甚麼想像力，我們便可以看到，它的顎腔是南灣，鼻子便是媽閣的最凹陷處，鼻孔便是內港的轉彎處，上眼皮的突角在位於林茂塘附近的沙崗，等等。”

（帕亞《澳門與公共健康》，1917年，第7頁）

衛生政策及細菌理論

1909年——“自從發現細菌理論之後，便對土壤、空氣、水源和住宅等一切直接或間接可以影響到人類壽命的因素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

根據這些研究而且依靠類似科學的進步，作為觀察及實用科學的衛生學已經找到了可以改善個人或集體物質條件的辦法，同時也可以改善人類的精神狀況。

已經得知衛生在各國人民經濟生活得失方面的巨大重要性。

失的方面，隨著可預防疾病死亡率的下降而下降；得的方面，隨著人類平均壽命的提高而提高，可以為社會資源創造很好的環境，其標誌是一個國家的個人有著很好的集體生活。

因此，提倡健康、提倡生活、提倡財富和提倡衛生。它向那些掌握人民命運的智者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雷登《澳門衛生》，1909年2月25日在澳門陸軍俱樂部的演講，第7頁）

在防治肺結核、黑死病和霍亂中， 宜採取城市建設的方針

1909年——“在澳門疾病分類史上，最常見的傳染病是肺結核。黑死病及霍亂在不同的年代都有爆發。

肺結核有一個滋生的環境，而且爆發猛烈。它的蔓延無止境，無聲無息，人人難免。它的觸角吸吮人們的體力。

似乎沒有藥物可以阻止它。因此必須治本，其本便是不衛生。

黑死病和霍亂也常常給我們發出警報。它們突然爆發，從外面傳進來，然後在本地紮根。

開始注意衛生可以阻止疾病的發展，但無法觸及病源，無法予以根除。某些病灶可能是暫時冬眠。

因此，從人類病理學上來講，最重要的是發病區的情況。疾病不過是一種表面的現象。

如果我們進一步仔細觀察的話，便可以發覺，機能的下降需要全面的治療。

已經清除那些擁擠的住宅區，消滅了骯髒的灶地，開闢了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的街道，建立吸水及下水系統來清洗地面。不言而喻，水的供應必不可缺。

這便是衛生工程要求做的工作。通過這些處理，會有很大改觀。

然而，僅僅進行局部處理是不夠的，蔓延會此伏彼起。

作為預防和根治的措施，必須立即新建健康、便宜的住房；住房健康與辦公室健康要結合；防止疲勞過度；通過對結核患者的教育和必要治療來消滅這些流動的傳染源；必須嚴禁酗酒和賭博；必須對嬰兒教育予以應有的重視；必須設立和進一步發展教育、預防與合作。這樣澳門才可以在預防郭霍氏桿菌中獲得勝利，才可以預防其他的傳染病。

因此，必須從社會方面開始醫治疾病。

顯然，在未建立新區來安置遷移的人之前，無法疏散那些已經感染的區分。

國家無論是自己出資還是通過扶持私人計劃，都不應該再拖延衛生及廉價房屋的建設。這個措施有衛生效果，而且絕對必要。

出租或贈送土地、資助或低息貸款，免交物業稅，通過種種的辦法來促進集體集資造房。通過這些辦法，從衛生和道德兩個方面在廣闊的社會問題方面進行工作。”

（雷登《澳門衛生》，1909年2月25日在澳門陸軍俱樂部的演講，第20-22頁）

最常見的疾病及澳門娼寮章程

1882年——“要考慮到，有兩組人為分類的疾病是最常見的。一組是氣管炎、腹瀉、痢疾、腸胃炎、腸炎、通常是每日性的間歇熱，然後依次是風濕病、臨時發燒及支氣管咽喉炎等，另外一組是皮膚病、癬子、膿腫、蜂窩組、小脂肪瘤、內生軟骨瘤、由火器造成的內傷和挫傷及結膜炎等等。發生過兩起潛伏高熱，一起昏迷性惡性高熱，3起急性肝炎，1起肝硬化，4起普通黃疸和6起肺結核病。未見其他熱症和天花。

性病的發病率一向很高。此類病人佔整個醫院收治人數的1/3。軟腫瘤的病例也很多。有普通的，也有伴隨尿道炎或腹股溝淋巴結炎，或者是這兩種感染和其他併發症並有。有一起潰瘍性腫瘤病例。同時淋病和普通淋巴結炎的情況很多。硬性或梅毒性腫瘤有5個病例，呈現的是第二及第三期梅毒症狀。

這些疾病的預防是首要目標之一，因此衛生委員會於1872年5月31日，向省最高當局提交了一個娼寮章程草案。這一規章按照命令，因該從第二年6月4日開始生效，但未立即執行，亦未根據提出了一些意見，對某些條款予以修改！”

（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澳門地們憲報》，1883年系列，《1882年澳城衛生局報告》，1883年3月30日，第188-221頁）

1886年(12-12)——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R系列，第319號卷宗內有一項關於妓女的規定，指出她們有自己的醫院。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9年——“制定了一個娼寮章程並在《憲報》上發表了。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直到現在仍未執行。只有一家日本妓院開始執行了這一規定。

不明白阻止了娼寮章程實施的障礙是何性質。總督閣下一再要求我編寫這個章程，財務委員會同意了關於公共收入方面的修改條款，華務廳廳長幫了我大忙，對章程有關條款進行了統一和修改，警察司令也對這一由您總督閣下下令起草，已經得到了政府委員會投票通過的法律的執行非常感興趣。警察已經逮捕了一些華人妓女，然而至今為止，這一規定不過是一紙空文，只有對日本妓女有效。說心裏話，我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戈麥斯·達·席爾瓦《衛生局局長報告》，1889年1月31日，登於《澳門地們憲報》，1889年3月20日第11號副刊）

1905年(7-1)——頒佈澳門妓院新規定，取代1898年8月10日之規定。

瘟疫、種痘所、規定及公共健康調查

1888年(2-2) — 成立種痘所。

1888年(12-13) — 在當時的《憲報》上公佈了海上衛生總則，其詳細程度從其22頁公文用紙的篇幅可見一斑。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9年(12-18) — 總督布渣下令對澳門的公共衛生進行調查。(參見《憲報》第51期)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903年(12-26) — 第52期《憲報》發佈公告，確保為所有到衛生局的人贈種牛痘。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568年1932年 — 從本殖民地開埠起，傳染病的流行可以追溯到1568年左右。根據我所掌握的很微少的資料，這些疾病有霍亂、天花、黑死病，尤其是1932年的脊椎腦膜炎。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24頁)

霍亂

1817年至1938年——“……我所找到的關於這一疾病的最早涉及是1817年。這一年在澳門，得霍亂死了一個英國女人。她是在中國的第一個英國傳教士醫生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Morton的女兒。她埋葬在賈梅士洞旁邊的英國公墓中。¹我沒有發現霍亂在葡人和華人當中傳染的記錄，但是有記載說，此病是從孟加拉傳染出來，然後開始在整個遠東傳播。1820年澳門再次出現了霍亂症。1821年再次流行。據福雷塔斯醫生說，“蔓延衝擊了整個亞洲的霍亂於1820年傳播到澳門。當年和

1. 白樂賈《澳門墓碑》。

第二年都造成了一些損失，……因此可以說，最首當其衝是非洲黑人和印度卡納臨人。在此之後，又發生過幾次霍亂流行，主要是1850年的那次。它奪去了當時剛剛到達澳門履新的官也總督的生命。在他死後，對其屍體進行了解剖。當時為他解剖的有5個陸軍外科醫生和1個海軍醫生，他們聯合簽署了驗屍報告，對當時受到破壞的病體組織進行了詳細的描敘。還有一次是1862年的那場流行，共有420人患病。此次霍亂流行的報告是由席爾瓦醫生撰寫的。它是關於霍亂流行的第一份印刷的報告，後在里斯本《醫學報》上發表。在此霍亂流行中，果阿籍貫的阿爾梅達神甫，²在他臨時建立的醫院當中，收治了數以百計的霍亂患者。其中許多人，根據席爾瓦醫生的報告說，如果不是這位神甫的努力，早就被奪去了生命。還有一次是1888年的流行。它首先在香港地區一支從葡萄牙來的部隊中流行。1902年又發生了一次大流行，蔓延了整個亞洲，一直傳染到了俄國和德國。³最近的一次是1927年那次，共有409人患病，其中320人死亡。1937年那次共有615人患病。1938年那次共有1059人患病。

如果我們來分析一下三個世紀以後的做法，可以看到，自從濟貧院成立以來，所有的霍亂患者、天花患者和其他傳染病的患者都是在濟貧院裏接受治療的。1789年成立陸軍醫院和1873年成立鏡湖醫院之後，軍人和華人患者開始在這兩個醫院裏接受治療。仁慈堂醫院甚至有一個專門為傳染病患者開設的病房。在1896年以前的澳門醫院統計資料中，可以見到在這個病房中治療霍亂和天花患者的記錄。

1897年霍亂爆發時的衛生局局長是席爾瓦。他成立了唐娜瑪麗亞隔離醫院。他當時禁止得了傳染病的病人在普通醫院裏進行治療。由於華人不願意在我們的隔離醫院裏接受治療，鏡湖醫院在澳門對面的對面山設立了一個臨時蓬寮。裏面的隔離病人由“郎中”給他們進行治療。在港務局的碼頭上，隨時有船將得霍亂的華人送到對面山。

2. 根據文德泉在《澳門及其教區》一書中說，據加爾西亞將軍的筆記，後關為總督夏官的二龍喉住宅現在已經改成了學校和幼稚園。當時它的業主是阿爾梅達神甫。曾兩次臨時作為霍亂病房使用。

3. 《從葡萄牙到澳門：歷史之旅》。

“在席爾瓦醫生擔任局長期間，根據以前的衛生局局長帕亞說，他通過秘密探聽，得知了華人當中有霍亂病例。”⁴但只有在1897年成立了醫療統計站以後，才對華人中間發生的傳染病病例進行了監控。

在1927年的流行當中，最初得知有48名華人患者。他們在我們的隔離蓬寮裏接受了治療。1937年、1938年流行的防治工作是由我領導的，大部分患霍亂的華人都自願接受了隔離和住院。在1927年霍亂爆發中，409名病人中48人進入隔離室；在1932年流行中，128名病人中只有11人進入隔離室；在1937年流行中，615名病人中有497人病人進入隔離室；1938年，在1058名病人中有832人自願接受我們提供的隔離服務。⁵在這後兩次爆發中，第一次出現了位於對面山的鏡湖醫院的隔離蓬寮關閉的情況，原因是沒有病人。

在1927年的流行中，在澳門第一次使用了霍亂預防針。只有給極少數的葡萄牙人打了這種針。在1932年的流行中，為3000人打了預防針，其中500為華人。這是第一次在澳門開設了霍亂預防針站。華人踴躍前來接受預防針注射。在1937年的流行中，有3萬人打了預防針，大部分是華人。1938年，約10萬人接受了預防針注射，其中3500名為葡萄牙人。

我未查到在澳門誕生頭300年中，專職醫生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同時，關於這些疾病產生的原因也知之甚少，預防很空泛，而且是有問題的。“在19世紀第二個25年中，帕亞醫生說，當時的預防措施主要是用硫黃和瀝青來熏燒，以清潔空氣環境。據說，當時還使用石炭酸和拌了氯的石灰撒在被傳染的地方進行消毒。”

最早的霍亂預防措施是由當時的衛生局局長戈麥斯·達·席爾瓦所採取的，已經採用了那些有現代科學基礎的辦法。對此，1897年的衛生規章中已經做出了規定，例如，對病人進行隔離，對病人的糞便

4. 我的論文《澳門的流行病學》當中對此有所涉及。這是1925年在於東京舉行的遠東熱帶醫學學會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論文。

5. 由科斯達醫生編寫的1937年及1938年霍亂傳染病報告。

及住家進行消毒，郎中必須申報病例，用葡語和中文發佈預防措施指示，對來自西江流域和東江流域各港的旅客進行檢查。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25-228頁）

1881年——第43期《憲報》在採取適當衛生措施前，為了避免日本或爪哇發生的霍亂從那裏來的船將疫情帶上陸地，做出若干規定。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8年(8-27)一通告預防霍亂的措施，對主要症狀及處理方法進行了說明。《憲報》上公佈的通告由衛生司簽署。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6年(4-9)一是日本省衛生局公佈夏季預防疾病措施。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8年(8-16)一運載葡國軍隊的“印度號”運輸艦經香港抵割狗環海面，聲明船上有人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染上亞洲霍亂。從8月20日至9月9日，由東望洋行動中心劃出一條衛生防疫線以隔離上述地區。行動負責人為消防督察瓦吉尼亞斯少校，連他也染上霍亂，起初癥狀輕微，但終因腦部併發癥而死亡。在青洲的“孤泉”、氹仔，當然亦包括割狗環一帶紛紛搭建了臨時檢疫站。菜園和清真寺變成了墓地，致使該寺關閉了5年，其間穆斯林社團利用港務局附近一幅土地，由政府補助400澳門圓建起了一座臨時清真寺。澳門天天都有疫情警報，直到衛生局長施利華上校宣佈“疫情已被隔離在局部地區並得到控制”為止。流行病詳情與死者名單公佈於1888年《憲報》第327-338頁。聖嘉諾撒修女特萊西娜（後用其姓名為澳門一條街道命名）和比安嘉娣因忘我工作及勤懇奉獻而獲葡萄牙政府頒發勳章。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903年(12-26)——第52期《政府公報》發佈公告，確保為所有到衛生局的人贈種牛痘。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05年1919年—這些年中，在澳門因霍亂致死病案情況如下：1908年，15人死亡；1913年，2人死亡；1915年，1人死亡；1916年，32人死亡。這一資料係由衛生保健醫生雷登在《澳門年鑒》，1921年版，第30頁上披露。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02年(3-15)—第11期《憲報》上要求對在廣東省流行的霍亂採取預防措施。而第30期《憲報》則認為此疫已絕跡。

天花

1888年(1-26)—在澳門公佈措施，以防在本地流行天花，當時疫情只局限於香港。接種試管在東京購得。（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許久以來此病便在整個東方和遠東流行。一般認為它的發源地是中國。肯定從澳門成立以來，這個疾病在澳門的流行次數簡直無法勝數。在後面我們將看到，種牛痘是在19世紀初通過澳門傳入中國的。在澳門成立的頭三個世紀中，因患天花而死的病人很多。每年冬季都會在澳門出現天花，只有從1917年開始才必須進行接種，因此，幾年中未發生過天花流行，但是後來又有定期性的不斷出現。最近流行的情況如下：1917年共有105名患者，1917年有124名患者，1924年有195名患者，而1939年僅有38名患者。

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佩爾松的報告《在華引入牛痘的實踐，1805年》，是由他於1805年在仁慈堂醫院內傳入了預防天花的牛痘。⁶這是金納在1798年發表了動物種痘備忘錄之後不久。牛痘是由這位醫生通過從馬尼拉輸入已經種過牛痘的人帶來的。根據這位醫生

6. 根據文德泉神甫在《澳門名人錄》（第281頁）中所說，是由判事官阿利亞加將牛痘傳入了澳門。他曾自己的家中，為所有登門的人接種，但在318頁又說，是在白馬行醫院中，由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佩爾松進行了第一次接種。白樂賈在《澳門的早期醫學實踐》中持同說。

說，後來的澳門專職醫生戈麥斯（當時最高明的外科醫生之一）繼續使用這種辦法在澳門傳入痘種。我在各類檔案和當時的報告中，沒有見到任何關於在澳門進行第一次接種的記載。好像當時的接種是從一個人身上接到另外一個人身上。這種做法持續了許多年，後來澳門簡直成了人痘的倉庫，因為在1821年5月印度支那的國王還派遣一名在他王家內府供職的法國醫生埃斯皮帶來了幾個男孩來“接種”。判事官阿利亞加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⁷通過胳膊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接種當時在澳門是一種流行的做法。1858年，帝汶總督派遣了他手下的外科醫生科斯達到當時是在荷蘭人控制之下的苦盤去。他帶了三個兒童去接種，目的是“看看苦盤的牛痘是否有效，因為從里斯本和苦盤來的牛痘都沒甚麼效果。”⁸1864年，在佛得角天花大流行之後，當時將痘種通過幾個流放者的未成年子女傳入了該省。

後來從葡萄牙來的痘種是放在玻璃試片上面的。1855年，澳門首席外科醫生科雷斯帕通過澳門總督向宗主國政府申請，要求送來一些痘種玻璃試片，“看看是否比當地的痘種更有效，以便預防當時澳門城死人最多的天花的傳染。”⁸1855年5月29日，海軍及海外部送來了根據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報告是在最後一次接種時搜集的痘膿玻璃試片。⁸現在不難估計的是，這些放在玻璃試片上的痘種已經失去了毒性，沒甚麼效果。當時的一個醫生說得好，“主要的原因是痘種的變化，因為它一直放在玻璃試片上，而且放在密封的玻璃容器裏面。運送的旅行漫長，而且受到了高溫的影響。”他還補充說，“最好試試用由布雷同妮發明的玻璃試管來搜集痘種。”

1890年成立了西貢巴斯德研究所。眾所周知，他的第一任所長是科爾門特醫生。它的主要目的是在遠東成立一個防治天花的中心。它開始用密封的玻璃試管提供預防天花的痘種。從那時候開始，每年在澳門醫院中設立了免費的接種站。然而華人篤信他們的古老醫學，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此預防方法漠不關心，甚至有些抵觸。只有在1917年天花爆發時，通過當年2月2日的法令才規定了必須接種。在克服了華

7.《葡屬印度歷史檔案——澳門通訊》。

8.《海外委員會年報》。

人的抵觸和恐懼之後。才可以挨門逐戶對所有的澳門居民進行接種。後來效果非常好，整個澳門居然在好幾年之內避免了天花的流行。從那時開始，華人自願在幾個衛生局每年都設立的接種站接種。我們可以舉個例子，1932年，當廣州和香港爆發了天花時，成百人發病，因此在澳門加強了接種，26000華人自願接種。在澳門只發生了一起天花病例。⁹此外，澳門的天花防治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因為澳門的海上和水上浮動人口太多，變化太大。

天花患者一般是在普通醫院裏接受治療，例如仁慈堂醫院和陸軍醫院，還有就是在他們自家接受治療。在1891年的澳門疾病統計內，當時在陸軍醫院中有7人住院治療，3人住在仁慈堂醫院，7人由專職醫生佛朗哥在他們家中對他們進行治療，5人由首席外科醫生阿爾瓦雷斯治療，6人由專職醫生阿爾梅達治療，4人由科洛梅爾治療。1927年2月的法令繼續允許天花患者在他們的家裏接受治療，前提是他們的保健醫生認為在家裏不會對公共衛生產生危險，然而從1924年那次天花流行開始，所有的天花患者必須自願住進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根據文德泉神甫在《澳門名人錄》(第281頁)中所說，是由判事官阿利亞加將牛痘傳入了澳門。他曾在自己的家中，為所有登門的人接種，但在318頁又說，是在白馬行醫院中，由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佩爾松進行了第一次接種。白樂賈在《澳門的早期醫學實踐》中持同說。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28-231頁)

1916年——我剛到澳門時，必須馬上投入對天花的防治。當時我看到，我們的隔離部門讓華人十分恐懼。那些在上門抽查發現的在家中的華人患者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儘管員警對他們進行了監視，往往還沒有等到我們那些運他們去隔離病房的擔架到達之前，他們已經逃到了位於對面山的鏡湖醫院的隔離蓬寮中。當時在華人中間對於我們所設立的名叫“唐娜瑪麗亞”癲瘋院裏面的隔離醫院有種種荒誕不經的傳說。華人間傳說，只要住了進去，就不會活著出來！正是這種恐懼

9.《澳門衛生公報》，1932年。

使得華人在許多年之內遠遠地躲避我們的醫院，因而使得我們在三個世紀內無法控制這一疾病。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36頁）

1917年(1)——第5期《政府公報》規定必須進行天花接種或二次接種。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17年(3-8)——天花流行（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602號卷宗，第S-U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腺鼠疫

1895年——貧窮、骯髒、水窪和缺乏衛生條件，這一切使得瘋堂區在該年的腺鼠疫流行中，成了最厲害的地區。20世紀最後一名澳門總督加亞爾多，出於這些原因，下令摧毀這些“形狀不同、感染的”的住宅區，然後建立了非常整齊，現在仍與眾不同的和隆新區（參見1895年—(3-4)）。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95年(4-10)——腺鼠疫肆虐澳門、香港和廣州。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95年——“儘管腺鼠疫在廣西和雲南已經是一種長期的流行病，很久以來給它起的名字叫老鼠病，直到1894年才在雲南徹底消滅了它的病源。當時這一病源一方面波及到了廣州、香港、澳門，最遠至臺灣，從另一側傳播到了孟買、果阿、達曼、馬賽和倫敦，1899年終於傳到了波爾圖。

由於沒有任何關於澳門成立頭300年歷史中關於此病的記載，我估計，它在澳門的流行始於1895年，因為當時的外科專職醫生馬雅¹⁰記錄

10.《澳門開港回憶錄》。

的香港1842年的“腺鼠疫”不是真正的腺鼠疫，而是當時在香港開埠之初，經常危及到英國人生命的瘧疾。

如同我們前面說到的那樣，1849年的腺鼠疫傳染在當年就傳到了廣州和香港¹¹，死了1000多人。一年以後，也就是說到1895年才傳到了澳門。在澳門的傳播是1895年4月開始的，直到7月共有1200人死亡，都是華人。從1895年到1915年這20年期間，除了1910年和1911年沒有發生任何病例，該病一直是長期的流行病。時有爆發，例如在1898年那次流行中，有594人死亡，1900年的爆發中，有500人死亡，1907年爆發中，有1100人死亡，1909年有400人死亡，而當時的總人口約為7萬人。

在1896年腺鼠疫蔓延時，才在唐娜瑪麗亞碉堡腳下設立了名叫唐娜瑪麗亞癩瘋院的隔離病房¹²。1897年的衛生條例對病人隔離有如下的規定，“歐洲人、澳門土生、印度人、非洲人和華人天主教徒染上霍亂或腺鼠疫之後，送入在澳門郊區設立的癩瘋院，華人患者如果不願意接受歐洲治療，可以送到外地，送到鏡湖醫院值理會設立的一個隔離蓬寮中。它位於澳門內港的對面，但在葡萄牙領水區域內。從今以後，凡是患有上述兩種病的病人不得在普通醫院中接受治療。”因此，在1898年的腺鼠疫流行中，共有594名患者，但只有27人在唐娜瑪麗亞癩瘋院中接受了治療，其餘者或死於家中或前往了鏡湖醫院的隔離蓬寮。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16頁）

1896年——高士德總督不僅僅是為這些區¹³設立了清潔系統，同時也清除了位於沙崗的華人墓地。當時這墓地有幾千座墳丘。同時多得他才採取了衛生局建議的預防措施，使得澳門躲避了1894年的腺鼠疫流傳。當時該病在廣州及香港蔓延十分兇猛。所以市政府在1896年6月8日的會議上，宣佈向這位總督授予功勳人士的榮譽。

11. 眾所周知，是在1894年的香港黑死病流行中，才由葉兒森發現了黑死病桿菌。

12. 今天已經改成電臺-電報站。

13. 塔石、龍田村、望廈和新橋的填海地及瘋堂區和板樟堂區的改造。

1897年——是戈麥斯·達·席爾瓦醫生(最傑出的衛生局局長之一)在澳門大力防治了此病。他採取了當時少見的科學方法。在獲得防治瘟疫的經驗之後,他發表了兩篇論文,《1897年澳門及對面山腺鼠疫報告》和《關於使用葉兒森血清方法醫治腺鼠疫的報告——1897年》。遺憾的是,這些報告我未能找到,無法查閱。這可能是在澳門所發表的最早的關於腺鼠疫的論文,也是最早的關於用防治腺鼠疫血清進行治療的論文。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31-233頁)

1901年(4-27)——是日第17期《憲報》及7月17日第33期《憲報》規定對抵達本澳的腺鼠疫的患者施行消毒及隔離的措施。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09年——虧得在所有水喉口安裝的防鼠虹吸管,根據帕亞醫生說——才在裝有這種虹吸管的區裏根除了腺鼠疫。對和隆區和瘋堂區進行了同樣的工作後,根據阿爾梅達說——在這些地方明顯地看到,腺鼠疫已經根絕,這使得衛生委員會建議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安裝同樣的水壓虹吸管。”的確這樣做了,直到1915年,在流行了近20年之後,在所有的下水管道裝上這種虹吸管以後,腺鼠疫才滅絕了,然而此種病在香港一直蔓延到1923年,儘管澳門每天向這個英國殖民地進行通報。當時開始的衛生清洗已經包括在1897年的衛生條例中,“必須用從海裏吸汲的鹹水沖洗,通過氣泵將整個下水道充滿海水,使老鼠無法生存”。這種辦法為滅絕澳門的腺鼠疫做出了貢獻。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33頁)

1910年——“主要的預防措施有對通過各條火輪航線來澳門的乘客和貨物進行檢查;由編內醫生進行家訪檢查,因此把城市分為了若干衛生區;同時勒令所有“郎中”必須通報病例,等等。從1910年開始,開始打預防針。”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33頁)

1909年(4-20)——腺鼠疫流行。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09年(8-28)——衛生科科長及細菌化驗所主任提呈1908年西部鼠疫在澳門流行報告。報告中提出防治鼠疫建議及秘書處關於此問題的看法。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黑死病

1911年(2-2)——瘟疫——將本澳分為不同的衛生區，以防止鼠疫並採取各區醫生登門巡診措施。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11年(2-16)——為避免“黑死病”傳入澳門，政府規定，停泊在各港口未經消毒的船隻未經醫生檢查之前，不得自由行動。衛生局局長建議設立消毒站並提出一衛生規則。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11年(5-1)——瘟疫——醫務局，基於香港鼠疫的不斷發生，建議由鏡湖醫院在對面山設立一痲瘋蓬寮，所有抵澳船隻船長必須申報船上是否有病人。後來做出的決定是，在現有設施不夠用的情況下，可建造蓬寮。政府曾詢問說是否可以派人上船檢查，醫務局認為此議不妥。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878年已有三百年歷史的遠東第一所治療痲瘋病的白馬行醫院中收治的痲瘋病人將轉移到葡萄牙行政管理下的小橫琴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1年(4-4)——決定在氹仔設立女子痲瘋院。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2年(7-6)——小橫琴島白沙林痲瘋病人人數為40名單身和7名已婚男人(妻子未陪同)。女性痲瘋病人18人並已確認染病。兩名已婚，

但未與丈夫同居，11名未婚，5名寡婦，其中4名初來時已喪偶，帶著兩名幼女（經資料分析，不是帶病毒者）。禁止他們同住一室。“但無法阻止他們來往”。癲瘋病人耕種一塊稻田，以便渡日和維生。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2年——“衛生局局長彙報了白沙林癲瘋院的情況。同時還做了一些評論和建議了一些他認為適當的預防措施。在此報告的基礎上，制定了第61號省法令。在此法令中，除了其他的規定之外，明文規定，所有的癲瘋患者，所有在路上遊蕩的癲瘋患者將被送交當時在陸軍醫院值班的有關醫生，以便為他們進行確診，然後將患有像皮病的人送到白沙林癲瘋院，其他病患者則送到鏡湖醫院。因此衛生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負責與氹仔西政廳廳長一起在那裏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來為女癲瘋患者起造一住院。

（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澳門地們憲報》，1883年系列，《1882年澳城衛生局報告》，1883年3月30日，第188-221頁）

1882年(7-28)——對白沙林收容所接收癲瘋病人做出規定，並確定了在街上遇的病人的措施。決定男女收容所完全分開。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3年(9-29)——立案在氹仔建設一所癲瘋院。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5年(1-20)——九澳癲瘋院在選址問題上遇到重重阻力並幾經改變，先是在澳門（馬交石、關閘），後來又是氹仔或路環，最後終於在是日將建成的、有警衛和劃定禁區的癲瘋院交付使用。設施至是年5月才能裝備齊。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5年(5-3)——為避免交叉感染與擴散，小橫琴島女性癲瘋病人被轉移路環九澳癲瘋院。男人仍留在小橫琴北岸。（參見1885年(5-26)）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5年(5-26)——氹仔西政廳廳長向秘書處匯報：“九澳收容所準備接收女性癲瘋病人……。然而在4月30日至5月3日期間，根據政府命令，已經安置了來自小橫琴島的女性癲瘋病人。癲瘋院條件良好，其證據之一就是該院曾於該年9月曾遭約12名“手持大斧和手槍”的海盜的劫掠，他們搶去了這些可憐的癲瘋病人的全部冬裝和半個月的口糧（計160斤），以及7塊現金，然後到海灘乘一小舢板趁夜幕逃去。搶劫並非只此一次，因為他們知道癲瘋院供給充裕，而且無防衛。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916年(6-9)——小橫琴島白沙林癲瘋院病人申請將其居住的棕櫚葉蓬寮改建為石質建築（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221號卷宗，第S-E號文件；參見1916年8月5日條）。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16年(8-5)——通過第32期《憲報》，可知根據第34期《憲報》的規定，已下令為白沙林癲瘋收容院建立磚石房屋。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衛生設備及服務

1865年——對當時的醫院，在澳門首席外科醫生奧古斯托·達·席爾瓦向海事及海外衛生委員提交的當時三年的報告中有所涉及。該報告刊登於8月21日第34號《澳門政府憲報》上，現轉載如下：

4 醫院

澳門有兩所醫院，一所是陸軍醫院，另外一所屬於仁慈堂。

《政府憲報》每月公佈一次濟貧院醫院病人的情況。稱之為醫院，又加上濟貧院，我認為這種叫法不妥當。這個機構是由阿爾梅達神甫構思成立的，他對此專心致志。它靠私人捐贈來維持，現由一個由德高望重的神甫組成的委員會來領導。它收治病入膏肓的華人。收治他

們的主要目的是讓他們成為天主教徒。所以那裏的死亡率驚人：例如，3月份那裏入住了44個人，其中39人去世，33人臨死前接受了洗禮。¹⁴

所以在此節中，我僅僅敘述上面說過的兩個醫院。

陸軍醫院

陸軍醫院設立原屬奧斯定會修會的修道院中。在各修會遭取締之後，利用這所房子來作別動隊的兵營，後來又改成現在住在聖家辣修院的修女的住地。

1855年11月21日的省政府法令關閉了當時設在仁慈堂醫院樓房中的老軍事門診所，成立了陸軍醫院。如同上述診所，陸軍醫院仍然設在上述仁慈堂醫院樓中。直到1857年6月6日，陸軍醫院的病人才被轉入現址。陸軍醫院的成立主要是我的前任首席醫生科雷斯帕的功勞。醫院的樓房位於一座山丘之上，距海200多米，處在葡萄牙人聚集街道的中心，居高臨下，而且離附近的樓房有一定的距離。可以眺望大海，並可以看到城市北部、東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它的採光條件很好，如果它的西部不毗連教堂的話，那就更好了。

這座樓房由四個主要部分構成。它如同一個四方形，中央有一個院子。每個部分面朝一個方向。

南部是這座樓的主山牆。它的上一層有會議室、病例室、病人接待室、護士長室和外科手術用具儲藏室。軍官的房間一個有四張床，另外一個有兩張床。這些房間的對面有一個長廊，長廊的底部有一座向東的窗戶。下一層是警衛值班室和兩個鋪有地板的禁閉室，裏面分別可以放八張床和兩張床。

14. 在這一機構裏，病人由一個郎中或稱巫醫治療，因為沒有足夠的收入來設立一個長期的病房。直到1862年才開始收治霍亂患者，原因是要研究它，所以我才注意到果阿的阿爾梅達神甫不僅是那個機構的主任，而且還是最勤懇的護士。只要人們告訴他那裏有被遺棄的病人，他一定去那裏把他接回來。他從未考慮過自己的健康。

東部的上層是兩個病房。它們之間有一間小房子，裏面安放著天氣預報工具。分別為13個床位和14個床位。在必要的情況下，每個病房還可以臨時增加兩個床位。與這兩個病房並行有一個走廊，從它的窗戶可以看到內院。底層是解剖室，還有一個很大的鋪設了地板的病房。只有在粉刷樓房的時候，才將病人集中在那裏。這個病房可以安放18張病床。

北部有一個很長的走廊，沿著它有很多房間。其北端為助理護士房間，有兩個病房，分別擺7張病床，二等護士房間，衣服儲藏室，其東側盡頭是廁所。走廊相反一側有三個下級軍官的房間，有窗戶可以看到內院。每個房間有兩張床。底層是洗澡間和雜物間。

西側只有一個走廊，有面對中心院子的窗戶。其另一側為教堂，因此這一側不需要通風設施。共有13張病床。下層走廊是通向教堂聖器保管室的過道。

醫院有三個院子。其中一個靠著北部，裏面是廚房，中國二廚宿舍，有一個水量充足、水質很好的水井。另外一個院子與東側相連，不久前在裏面種了幾棵樹，目的是讓康復者可以做室外活動。

整個樓房已經陳舊。下大雨颳大風時，頂棚總是要進行緊急修繕，但是每次都沒有能夠徹底修好。只有經過全面的修繕才能為這所樓房提供一所優秀的醫院所需要的一切條件。然而，不需要很多破費多開幾扇窗戶並為現有的窗戶安裝必要的通風設施，便可大大改善病房的衛生條件。總督閣下準備下令進行這些裝修。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講，樓房最好保持潔淨。

陸軍醫院有足夠的服裝，器具並不缺少。我來到澳門時，曾經要求添置大量的物品。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因此彌補了一些缺陷。如同閣下所知，同時我也申請了一些外科手術箱，一些電磁儀等等，所以本醫院並不缺少用以滿足本殖民地目前需要的主要物品。醫院有68張鐵床。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可能接納超過這一數量的病人，因此，有足夠的病床為病人服務。軍官房間的床比普通房間的床要舒適得多。

陸軍醫院唯一的收入是入住接受治療的病人所支付的醫療費用。這些款項扣留在財政局，凡是不從國家開支的病人的醫療費用也轉到財政局，當然，財政局承擔一切費用。赤字，如果可以這樣叫的話，有時並不大。整個醫院一年的病人收治平均數，在最近的3年，從1862到1864年是716個。

整個醫院按照我呈報的規則運作。這些規則已經得到上級的批准，因此，在此我向閣下轉呈一份，包括各種不同的圖表、各種文檔及病人出院證的範本。同時還有醫院員工的花名冊。在這份報告裏，閣下可以看到我對這些工作人員的住房、士氣和工作表現方面的情況作的彙報。

仁慈堂醫院

這所醫院名叫拉法爾醫院。1569年由時任尼斯和中國及日本主教的卡內羅成立。同時他成立了仁慈堂，並任第一屆董事。這是一份關於這位主教生平中記載的資料，因為這個機構所保存的可以查閱登記簿是1743年，還有一本是1722年的，但不是原始資料。

1747年，科埃略董事建議重建這一醫院並得到了實施。在仁慈堂當年的會議記錄上，我們可以看到，“因為那個地方很髒，已經不適合人居留，需要有門、窗、新的小祈禱堂和供男女分別使用的場所。”仁慈堂大樓的牆上有一塊銘牌說，該樓是由上述董事興建的。

1840年，在當時的董事賽阿布拉外科醫生的建議下，又進行了大規模的重要修繕工程。主要工程是加蓋一層和翻修頂棚。為此，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和外國人之間進行了募捐，共捐得3303澳門圓。整個工程的費用為3194澳門圓，於1842年結束。工程期間的董事是佛雷塔斯醫生。當時又花了884澳門圓對大樓進行了其他修繕。

整個大樓位於一座山丘的底部。山丘可以抵擋北風。其地勢低窪、潮濕、四周都是私人住宅，有些住家位置高過它。因此它沒有這種機構必須擁有的優良採光條件。它是一個整體結構，西西南—西西

北走向。其兩側端還有一些附屬結構。建築中有一個中央小祈禱堂，兩側完全相同，然後通過詠唱臺連接。小祈禱堂兩側各有一與病房相通的更衣室。兩個部分均為上下兩層。

西西北部分供男性病人使用。其下層僅有一個有8扇相對窗子的病房。4扇朝向院子，另外4扇對著入口院子。這些窗戶以及西西南部分病房的窗子是唯一開到地面的窗戶，而且是在總督閣下參觀了仁慈堂以後，按照我的請求才開關的窗戶，主要目的是給比較潮濕的病房提供它所缺少的空氣和陽光，病房長16腕尺(0.66米)，寬8.08腕尺，高3.04腕尺。下層的病房長19.08腕尺，高3.09腕尺，寬度與下面的病房相同。這層中央有一長廊，裏面有5扇面對院子的窗戶。在4個收治私人病人的病房中，有一個面向入口院子的窗戶。在樓這一端的底層有三個病房，裏面收住的是傳染病患者。藥品及外科手術用品室也在底層。

西西南側供婦女使用。其底層只有一個病房，尺寸如下：10腕尺長，8.08腕尺寬，3.04腕尺高，共有6扇相對排列的窗子，開關方式與另外一側底層的病房的窗戶相同。上層有一個尺寸相同，窗戶數量相同的病房，其分配也與另一側所擁有的房間數量相同。其頂端有兩個小房間，供護士和書記員居住。

醫院有一個院子，也一分為二，一部分供男人使用，另一部分給女人使用。院子當中有兩個沒有鋪設地板的禁閉室，廚房條件很差，還有停屍房，還有一些供那些由仁慈堂養的貧窮老翁老婦的房間。在屬於女病房使用的院子那一側，有一口優質水井，但是水量不夠整個醫院使用，因此，遇到旱季，必須從外面運水進來。很有必要在院子的另外一側打一口新井，不僅僅是為了有足夠的水源，同時為了避免醫院兩個部分經常的來往。

整個樓還需要清潔打掃。總的來說，醫院並不缺甚麼東西，但是衣服和用具並不是很充分，而且並不很適於病人使用。也沒有好用的外科工具，在必要情況下，只能借用陸軍醫院的設備。從我呈報給您的清單中，您可以清楚的看到有關情況，同時還附有食堂的食譜，還有各種病人要填寫的表格。我來的時候，都已經做了一些必要的調

整，但是現在還沒有印刷。此醫院，如同陸軍醫院，缺少表格，所以我引進了里斯本海軍醫院的表格，只不過是增添了一些適合本地的內容，供在未制定適合這裏的氣候情況的表格之前暫時使用它。醫院員工的數量及其它情況。可見報告的附件。作為規定，只有一些1837年的指令（針對男護士和女護士），現將副本呈上。

收治某些病人獲得利潤是本醫院唯一的收入，但是不足以支付費用。收治的病人數量不大，而且大部分都是窮人。近三年來平均收住的數量為131人，然而醫院每年支出的平均（以1859年到1864年6年為依據）費用是1480澳門圓，每年收治病人的收入是564澳門圓，所以，可以看到收入僅僅可以支付開支的三分之一。

似乎仁慈堂無足夠的財政資源來使它的醫院達到應該有的條件。某些可能受到偏見阻撓的改革可能會降低了一些開支，將其用於醫院運作中去。

醫院的收入如下：財政局撥款22399澳門圓，這佔年收入的5%；在香港的幾個銀行當中的3萬存款，分別可得5%、6%和7%的利息；有13處小物業出租可獲得1300左右澳門圓的收入；2塊土地的地租可以收入52澳門圓；每年4次彩票可獲得788澳門圓，還有醫院本身收入的564澳門圓，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零星收入。根據最近6年的平均數，每年的收入為5918澳門圓，而平均支出是6315澳門圓。只有在1862年才盈餘了191澳門圓。

由此可知，目前的情況似乎不允許仁慈堂醫院進行大規模的修繕。

5 藥房

澳門只有一個藥房，是屬於私人的，而且位於城市最繁華的街道。在我1863年1月12日回覆閣下同年10月28日第54號公文的第一號公文中，已經向您彙報了這個藥房的情況以及它向本城醫院供藥的情況，同時向您彙報了兩所醫院每年由它供藥的費用，以及為何不由國家設立藥房的原因。無任何要增加的新內容。

1869年——“目前澳門有3家藥房。全部位於南灣，這是澳門主要的街道。里斯本藥房的業主是蘇札藥劑師，澳門藥房的業主是福雷塔斯藥劑師，便民藥房的業主是在果阿獲得藥劑師資格的特勒斯。第一個藥房仍在繼續向本澳的兩所醫院供藥。這些藥房都很乾淨，而且貨源充足。這一情況我已向您作過彙報。”

（奧古斯托·達·席爾瓦《1869年澳城衛生局報告》，《澳門地們憲報》，1870年第52期，第219頁）

1870年——在澳門衛生局局長奧古斯托·達·席爾瓦醫生的報告中，可以讀到下述關於陸軍醫院和白馬行醫院的情況：

“如同我多次重覆的那樣，陸軍醫院很久以來便要裝修了。這對於妥善安頓所有的病人和工作人員來講是必不可缺的，因此對這所醫院和城市的衛生也有同樣的意義。1870年4月27日，我申請對這所醫院的門、窗和地板進行油漆。此項工作從1863年3月起便未進行過；在主要入口邊上設立一警衛室，用來控制與聖器室的來往，再蓋兩座軍官病房和一個衛生間。油漆和警衛室工程已經完成。與聖器室的來往對於院內的秩序和病人的安靜十分不宜。對此，已經得到上級批准的部令中曾予以禁止，但現在又依然如故。

本年三月，我再次要求對陸軍醫院進行翻新。按照我的職責，我曾指出，這個醫院因為缺少必要的衛生條件可能成為傳染的病源，至少，那裏有時發生的情況對於病人是有害的。陸軍醫院翻修情況簡單彙報如下：要添建新的病房和其他房間並要給西部與教堂相通的那部分添加至今未有的通風設備。

最好的改進辦法是取消這一教堂，然後，在教堂的位置，按照最合適的方法，增建一些新的部分。在它們之間蓋一個院子，以便通風採光，這對於醫院來講是必不可缺的。因此有必要在下層設一個小祈禱堂，方便病人使用。奧斯定堂便是醫院目前所在的修道院的名稱。這個教堂對於信徒來講有無均可，因為除了主堂，另外堂區的兩座教堂，還有聖約瑟堂、屬於仁慈堂的教堂、板障堂、聖家辣堂、瘋堂和白馬行醫院的小祈禱堂。這裏供奉的耶穌十字聖會神像可以移到仁慈

堂的小祈禱堂中去。不久前還拆除了加斯欄堂，將其開為陸軍營軍營。那些屬於現在已經被取締的教會的教堂現在已經不必要了。

或許可以保存教堂，但是它目前的三分之二部分應該充作他用，將主要大門開向西面，面對崗頂斜路。在此種情況下，為了提高它的深度，應該在盡可能的範圍之內多給醫院一些地皮。在醫院的東面建設如同切斷建築物其他部分的空氣和光線，而且可以推倒欄杆，在那裏種上一些樹木，以便供康復者散步使用。

白馬行醫院屬於仁慈堂。在最近兩屆董事會，尤其是目前的董事會任期內，迄今為止進行了大規模的裝修。整個大樓的入口進行了改造工程；新建了工作人員住房，使用更加方便了；為瘋人建造了三座房子；為女殘疾人設立了一個食堂；在女病區新蓋了一座兩層樓，衛生條件很好；在男病區邊開掘了一口井。這所醫院目前的設施很好，但是病人不多。”

1870年——澳門鏡湖醫院開張。

1872年(7-26)——決定建立軍事的醫院，開始平整土地。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72年(11-11)——通過並下令在若憲山上修建一所新醫院的計劃及預算。施工計劃刊登於1872年的第47號《憲報》。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72年(11-11)——關於建立新陸軍醫院的第71號決定，“醫院應建於若憲山上”並公佈“建築總構思”，《澳門地們憲報》，11月6日，第199-200頁：

澳門、帝汶及其他屬地總督決定如下：

工程局局長已經向我提交了建築一新陸軍醫院的計劃。這一醫院將建在若憲山山頂。其費用由本經濟年預算第6資金分配項內支出並已由6月11日的法令批准，因此，在獲得工程公所的圖紙批准和公物會的47,266,197澳門圓的預算批准之後，我決定由公物會進行招標。

一切有關單位必須瞭解這一決定並加以執行。

澳門總督仁伯爵

1872年11月11日於澳門總督府

未來陸軍醫院建築計劃

仁伯爵醫院

將建於若憲山頂

第一章

獨一條

“建築總構思”

所設計的樓房應該建在若憲山山頂上已經為此項目劃出的地皮上，其西側與同名碉堡相接。其長192腕尺，寬95腕尺。

在樓中央和前面的兩端有兩個突出部分，向前突出9腕尺。一開始是碉樓，最後是陽臺。

碉樓向外突出3腕尺，其面積是20x20腕尺。

它的面積是32x91腕尺。

主牆的走向是北東北-南西南。

大樓的地基高於地面4腕尺。

這個樓房有溝壑。分為不同的部分，前面的主題部分的上層的面積是50x20腕尺，主要用於會議室、主任辦公室和秘書處。

東北部塔樓的下層是小祈禱堂，上面為天文觀察室。南西南部塔樓的下層用於值班軍醫官的宿舍，上面用來安置原來在聖奧斯定教堂塔樓上的鐘。

在前面部分，在入口大廳的右側安排了如下的房間：

警衛室、護士室、5人軍官病房、6人軍官病房、3人病房，還有浴室和廁所。

右側是門房、護士長房，藥房、儲藏室和停屍房。

所有這些房間都在一個巨大的走廊上，它與前牆並行，其長度與整個樓房相同，寬度為9腕尺。

其他與此相交的樓房各部，總長為63腕尺。

3個中央部分是大病房，寬23腕尺。最大的和中等的可供20個病人使用。其他的兩個之間有一個小走廊。與另外一個大的相通。共是4個病房，兩個兩個一組。大的病房可以住12個病人，小的病房住8個病人。

在分析了這些病房的空氣立方米數量之後，減去床位及傢俱所佔的空間，這樣每個病人有40立方米的空氣。這對於每一個人來講綽綽有餘。而且這些空氣是不斷更新的，因為每個病人的病床都位於兩個窗戶之間。病房與病房都是隔離的，或是通過排氣箱或是天井。兩個大的長度為17腕尺，小的為12腕尺。

在病房的上面有一些多邊形的建築物，主要是用於澡堂和廁所。

多邊形建築物各部有5個窗戶。

在院子裏還將設立我們將詳細描述的蓄水池。

1882年(12-1)——隆重奠基。儀式由總督仁伯爵主持。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73年(12)——仁伯爵陸軍醫院工程落成。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884年——根據第50號《憲報》，原來準備在氹仔建立的樓房已經倒塌，將重建並改為軍營。在此之前，已作臨時軍營使用。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卷)

1901年——法國人欲購買海鏡酒店(Hotel Boa Vista)，將其改為供其在印度支那公民使用的療養院。英人懼怕法人在本地勢力膨大，極力反對此次交易。澳門政府將其徵用並以8萬澳門圓的價格售予仁慈堂。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01年——由於高士德總督才制定了這樣一個為來澳門這樣好的

氣候中康復的病人提供療養院的宏偉計劃。療養院將裝備水療設施。它將位於西望洋山南坡，在峰景酒店和媽閣之間。為此，根據1901年11月12月的部令，將這些地區的徵用宣佈為公益並決定由仁慈堂斥資在峰景酒店中設立一個為國人和外國人服務的療養院。不幸的是兩個月之後，由於高士德總督的去職，這一宏偉的計劃未能得以實現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1948年，第216頁）

1909年——在澳門設立一個大眾療養醫院已經是一種義務。澳門有許多行將入土的結核病患者，卻沒有專門的病房可以收治他們。有些病人是可以治癒的。

有兩個地方有很好的條件來設立這樣的療養院。一個是東望洋山山坡在華士古大馬路之上的地段，另外一個是若憲山西南坡的“白莊”。

它們遠離擁擠的房屋，沒有塵土，沒有工業煙塵，環境非常幽靜，而且在霧區之外。它有非常長和強烈的陽光照射，而且還有很好的地域條件。

地面傾斜，容易滲水，乾燥。

它一側朝西，另一側對西南。兩個地方均可以迴避從北向南再朝東的主要風向。

大風造成的降溫可以帶來危害，但是也許它比潮濕的環境危害要小。

風可以使空氣更加乾燥或更加潮濕。會使結核病人的咳嗽加劇，吐痰更加困難，而且呼吸加快，脈搏增速，有可能造成咯血，甚至可以帶來失眠。¹⁵

將山的兩坡加以綠化，尤其是在東望洋山，通過松樹樹梢的過濾，散發的松脂氣息所具有的治療作用，通過臭氧的殺菌作用，以及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可以使它的空氣得到改善。綠化可以調節風力。

15. 見拉斯雷克前引書的有關部分。

風力可以減弱或者完全消失，這樣溫度的波動更加均勻，不會忽高忽低。

在這裏建設一座療養院確實很好。

（雷登《澳門衛生》，1909年2月25日在澳門陸軍俱樂部的演講，第42及43頁）

1913年——民事醫院設立在一座很老的樓房裏，它同時還兼充殘老院及瘋人院。它看起來如同一座陰森的監獄。在這種地方不可能有衛生，不可能有科學。難以令人相信，在這種地方人們只能找到一個走向死亡的黑暗而淒慘的地方。

（馬查多《澳門事物》，1913年，第2版，第24頁）

1913年——馬查多《澳門事物》一書中（第2版，1997年，第124-126頁），這樣寫到：

“澳門有三所醫院：陸軍醫院、仁慈堂醫院及華人醫院。

陸軍醫院儘管有點老了，而且不符合科學的現代原則，但是唯一的一座看得過去的醫院。樓的外觀不錯，位置也很好，有寬敞、空氣新鮮的病房。注意打掃還是有一種清潔的感覺。乾淨並無壞處。然而，由於規章制度和它不夠用的面積，只能夠在那裏收治軍事人員、海員和港務局的警員。

仁慈堂的醫院簡直是一個令人噁心的地方。樓房老得不能再老，位於城市最狹窄的街上，四周都是住房，沒有材料，沒有人員，同時還要充作殘老院使用。凡是參觀的人都會感到不寒而慄，更不用說那些住在那裏的人了，就是呆幾個鐘頭也受不了。只接收天主教徒。非天主教徒只有在緊急和特別嚴重的情況下，才能夠接受治療。

即便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也算是仁慈堂做的一件大好事，因為歷屆政府從來未想彌補沒有醫院這樣一個不可饒恕的缺失，可醫院是我們引以為豪的文明的內容。

一般來說，華人不願意接受西醫和西醫療法的治療，只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才接受葡萄牙醫生的科學療法。因

此，所有的華人寧願去找他們的郎中看病，吃他們的偏方。對於那些為數稀少的不能夠在家裏看病或已經病入膏肓的人來講，有一所由有錢的華人資助設立的醫院，然而它是一個階級性的協會，而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接受病人的醫院。

鏡湖醫院的那座樓裏經常舉行本殖民地有影響的華人的會議，有一所重要的學校。那裏分發施捨，還有其他的慈善活動。那裏也有黑洞洞、十分骯髒的房間，只有一個床鋪。那些不幸、無依無靠的人在那裏等死。

看到這些對科學最基本原則的褻瀆令人感到難過。

在我們在中國呆了這麼長時間之後，現在已經必須讓人們普遍地相信歐洲的醫生和藥品，機不可失！

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不僅僅是華人去找他們的庸醫，很多情況下，澳門土生，甚至某些歐洲人也請他們治病。無知者的普遍傾向是相信那些最荒唐的裝神弄鬼。

看看郎中通過他們自己的知識來為病人把脈的確令人好奇。

他們摸著那圓圓的鏡片，所有的人都戴這種眼鏡。這些大智者用留著長長指甲的手指給病人診脈。通過手指感覺到的那些神秘症象，他們可以判斷出疾病的性質和嚴重性。然後開一些虎牙水(!)或者其他甚麼植物熬的水，然後就決定了那些相信這些巫醫人的命運。湊巧治好也是瞎貓碰死耗子。

成千成萬的人就是這樣生活的，他們把生命托付給這些郎中，而他們根本沒上過學。很多藥店也推波助瀾，貨架上擺著各種各樣耀眼的瓷罐。

即便華人願意接受歐洲法治療，甚麼地方可以收治他們呢？有哪個醫院可以收治那些不管出於甚麼原因不能夠在家裏接受治療的人呢？”

1915年(6-26)——衛生局發佈1915年報告(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350號卷宗，第S-R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16年(3-29)——向民兵營發送一套從其1914年成立開始的《政府公報》(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94號卷宗, 第S-B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7年(1-20)——陸軍醫院免費為本地人進行醫療(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300號卷宗, 第S-H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3-13)——在馬交石山設立患病兒童隔離、治療站(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516號卷宗, 第S-P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醫療衛生事業有了發展。政府醫院從1918年開始收治所有病人, 尤其是窮人, 大部分是華人。在中央衛生站和救濟團設立了門診。位於馬閣的海軍醫療站主要收治水上居民。育嬰堂主要收治兒童。同時還成立了診室, 免費分發藥品, 許多華人來此尋醫治病。……”

(科斯達《遠東的葡萄牙醫學》, 1948年, 第220頁)

1923年——1923年成立的衛生大隊已經編入了救濟團。它由一個衛生局專職醫生領導。它在本地的衛生健康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一年中, 對旅館、客棧、餐廳、工廠、戲院進行了上千次的檢查, 負責了街道和街市的沖洗, 要求許多房主清理院子。修繕管道並同主下水道接通, 還展開了滅鼠運動, 等等。

(同上, 同頁)

1917年(9-19)——在白沙林修建關於安置癲瘋病人的房屋(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370號卷宗, 第S-L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2)——澳門發生數起腦膜炎。此病從香港由途經該地前往法國戰場的澳大利亞部隊傳染而至。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3-13)——在馬交石山設立患病兒童隔離、治療站(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516號卷宗, 第S-P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3-21)——設立一衛生站(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121號卷宗, 第S-C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4-6)——第14期《政府公報》規定預防腦膜炎的措施。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8年(6-13)——在本省採取預防腦膜炎的措施。清洗街道及下水井(參見2月26日第221號卷宗。可以看到此病危險期很長; 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240號卷宗, 第S-E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9年(10-15)——成立首座培養男女護士的學校。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19年(10-25)——《政府公報》上頒佈衛生總條例, 規定將醫院易名為政府總醫院(代替仁伯爵陸軍醫院的稱呼)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20年(9-20)——阿德利諾·杜斯·桑托斯·迪尼斯醫生建議在本殖民地成立一完全免費的診所(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76號卷宗, 第S-C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21年(7-23)——蘇雅利醫生及阿德利諾·杜斯·桑托斯·迪尼斯醫生前往巴達維亞(澳門歷史檔案室, 民政管理檔, 第120號卷宗, 第S-I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4卷)

1924年(1-19)——(第3期《政府公報》上)頒佈的第9號立法性法規規定為所有永久女公務員提供60天孕產假。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24年(2-13)——在由本省政府為仁慈堂提供的一塊名為“高園”的土地上興建一新殘疾院(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5號卷宗，第S-A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便民藥房”的成立及運作

1916年(5-22)——“便民藥房”在議事亭前地第16號中開張(原弗朗克藥材雜貨店(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257號卷宗，第S-F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

1924年(1-16)——“便民藥房”業主殷基利藥劑師申請從倫敦進口一批藥品(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296號卷宗，第S-M號文件)。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4卷)